

沈善洪 王凤贤 著

# 王陽明哲學研究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# 王阳明哲学研究

沈善洪 王凤贤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王阳明哲学研究

沈善洪 王凤贤著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4.75 字数 98,000 印数 1-3,600

1981年2月第1版

1981年2月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2103·1

定 价：0.39 元

## 前 言

王阳明，在我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，是留下了自己的脚印的。他的哲学思想，在明代中叶曾经风靡一时。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，仍保持着广泛的影响，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。不论人们对这种哲学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，却都不能不承认它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。然而，解放以来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往往一概否定唯心主义哲学流派。在提到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时，通常把它与外国某个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加以类比，简单地斥之为为一丘之貉了事。认真分析它的论著，真是寥若晨星。我们认为，如同对于我国哲学史上所有著名哲学家一样，对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，有必要作系统的、深入的研究，弄清它的源和流，它的特点和内在矛盾，以及它的社会作用。这对于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特点，特别是对于探索封建社会后期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特点；对于科学地把握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，实事求是地探求思维发展的规律，将是很有意义的。

经过十年浩劫，人们看到了林彪、江青一伙的丑恶表演，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清除封建思想遗毒的必要。在学术界，正在以更大的精力来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，研究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，分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，揭示其对我国现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。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，首当其冲的是对宋明理学的研究。宋明理学，特别是其

中的程朱学派，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，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。宋明理学，对于当时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，具有广泛的、深刻的影响。这种影响，部分地变成消极的、惰性的传统力量，至今还残存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，成为压抑人们解放思想的重担。王阳明哲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派，它具备宋明理学所具有的一切共同之点。同时，在宋明理学内部，它又是作为程朱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，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点。因此，研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，对于肃清封建思想的遗毒，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。

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。他的学说对浙江以后的学者，如刘宗周、黄宗羲等人，都有深刻的影响。鉴于前面所说的那些理由，浙江省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，感到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，负有难以推托的责任。因此，我们虽然自知力不从心，还是勉力从事研究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以期成为引玉之砖。

作 者

一九八〇年十月

# 目 录

## 前 言

- 一 王阳明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····· 1
  - (一) 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····· 1
  - (二) 王学产生的社会原因····· 7
- 二 宋明理学的一个学派····· 19
  - (一) 宋明理学的共同特点····· 19
  - (二) 宋明理学的发展和王学的产生····· 30
- 三 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····· 42
  - (一) 关于“心外无物”论····· 43
  - (二) 关于“心外无理”论····· 48
  - (三) 关于“感应之几”论····· 53
  - (四) 关于“万物一体”论····· 57
- 四 先验主义的认识论和禁欲主义的道德论····· 64
  - (一) 关于“良知”说····· 64
  - (二) 关于“致良知”说····· 76
  - (三) 关于“知行合一”说····· 88
- 五 王阳明学派的流传和分化····· 98
  - (一) “天泉证道”和王学的分化····· 98
  - (二) 从追求“心之本体”走向否定封建道德····· 106
  - (三) 从“事上磨练”走向唯物主义····· 117

六 关于王阳明及其学说的评价 .....	124
(一) 学术界对王学的不同评价 .....	124
(二) 对王阳明政治态度的评说 .....	127
(三) 对王阳明哲学思想的评说 .....	132
(四) 对王阳明教育思想的评说 .....	143

# 一 王阳明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

## (一) 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

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，也是一位重要的教育家。在政治上，他是一个忠实地为明代封建王朝效力的官吏，但又受到宦官势力的种种打击和迫害；在哲学上，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，在冲破程朱学派的长期统治，活跃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空气方面起过某些积极作用；在教育上，他继承和丰富了我国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，反对道学对当时教育的禁锢和毒害，颇有点儿革新风格和求实精神。王阳明的学说，不仅在我国近古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而且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王阳明，名守仁，字伯安，生于一四七二年（明宪宗成化八年），卒于一五二九年（嘉靖七年），终年五十八岁。因为他曾经隐居会稽阳明洞，又创办过阳明书院，所以世称阳明先生。王阳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。据《年谱》记载，他的祖先是琅琊人（现山东境内），第二十三世迁居浙江余姚。他的父亲王华，是明代宪宗成化年间的状元，官做到南京吏部尚书。



青年时代的王阳明，就关注北方边境的安全。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后，即向明孝宗皇帝疏陈边务八条，建议采取蓄材备急，舍短用长，简师省费，屯田足食，行法振威，敷恩激怒，捐小全大，严守乘弊等措施，要求朝廷斟酌施行，以加强北方防务。不久，他被任命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，后又改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。王阳明三十五岁那年，宦官头子刘瑾胡作非为，矫旨将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逮捕入狱。王阳明抗疏引救，指出这种做法“使陛下有杀谏臣之名”，“宁不寒心”，要求“陛下追收前旨，使铣等仍旧供职”，（《王文成公全书》卷九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》。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）结果，他被廷杖四十，谪到贵州龙场驿当了四年驿丞，在深山中受尽了苦难和折磨。以后，王阳明先后担任过江西卢陵县知事，南京刑部、吏部清吏司主事，文选清吏司员外郎，南京鸿胪寺卿，都察院左金都御史等职。一五一九年（正德十四年），明王朝的宗室宁王朱宸濠在江西起兵谋反，这是王室内部分争皇位的斗争。王阳明站在皇帝朱厚照（武宗）一边，起兵平定了宁王叛乱。但由于朝廷内部宦官势力的挑拨，王阳明在平乱过程中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并没有得到皇室的信任，反而被诬为曾参与朱宸濠的谋反活动。一五二一年，王阳明五十岁，被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。

王阳明政治生涯中的主要任务，是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。他曾出任过江西巡抚，镇压过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诸省区的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军。根据他给武宗的奏疏中记载，被他杀害的起义军达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八人之多。就在临死之前，他还总督两广军务，率部镇压广西思恩、田州

和八寨瑶族、壮族的起义军。当时，他对少数民族起义军采取了“可抚则抚，可捕则捕”的两手策略，对思田起义军的首领卢荪、王受搞“行抚”，使其接受了“招抚”；而对八寨渐藤峡的起义军，则采取了军事剿灭的手段。王阳明“扶病起程”，病死归途（在南安舟中），血腥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军的行径，充分表现了他至死为明王朝卖命的决心。所以，说王阳明双手沾满农民军的鲜血，这并不过分。

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演变和形成，经历过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。对此，黄宗羲概述说：

“先生之学，始泛滥于词章，继而遍读考亭之书，循序格物，顾物理吾心，终判为二，无所得入，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；及至居夷处困，动心忍性，因念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，忽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不假外求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。自此之后，尽去枝叶，一意本原，以默坐澄心为学的，有未发之中，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，视听言动，大率以收敛为主，发散是不得已。江右以后，专提致良知三字，默不假坐，心不待澄，不习不虑，出之自有天则。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，此知之前，更无未发，良知即是中节之和，此知之后，更无已发。此知自能收敛，不须更主于收敛；此知自能发散，不须更期于发散。收敛者，感之体，静而动也；发散者，寂之用，动而静也。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，无有二也。居越以后，所操益熟，所得益化，时时知是知非，时时无是非，开口即得本心，更无假借凑泊，如赤日当空，而万象毕照。是学成之后，又有此三变也。”（《明儒学

案》卷十《姚江学案》)

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王阳明的学说，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和形成以后，各有“三变”，也就是各有三个发展阶段。王学形成过程中的“三变”：一是学习程朱理学；二是出入于佛道；三是学说之形成。王学形成以后的“三变”：一为默坐澄心；二为专提致良知三字；三为所操益熟，所得益化。

王阳明开始学习时，主要是应付考试，“泛滥于词章”。不久即“遍读考亭之书”，钻研起程朱理学来了。在王阳明所处的时代，程朱理学被奉为儒家的正统，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。青少年时期的王阳明，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学说的教育和影响。据《年谱》所载，王阳明开始就塾师读时，就把“读书学圣贤”作为“第一等事”。十八岁那年，王阳明路经江西广信，谒见理学家娄谅（即娄一斋），听取他讲述朱熹学派的哲学观点。后来，王阳明白天听塾师讲析经义，晚上搜取经书，读至深夜。当时，他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，还学习诗赋词章，钻研八股文。王阳明是个善于思索的人，他虽然接受了朱熹的哲学观点，但并不盲从。二十一岁那年，他正跟随父亲住在北京，看到官署庭中长着许多竹子，就与一位姓钱的友人做起朱熹所说的“格物”的工夫来，企图穷究竹子这一具体事物，从中体认出派生万物的“天理”来。起先，由那位友人去“格”，苦心捉摸了三天，一无所得，人却生病了。王阳明还以为是这位友人才力不足，就亲自去“格”，沉思了七天，同样毫无结果，自己也病倒了。从此，他对朱熹那种把“物理”与“吾心”分开的学说发生了怀疑。随着王阳明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进展，使他越来越感到朱熹的学说“支离决裂”，不利于振兴封建道德，挽

教明王朝的危机，就对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。

王阳明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，是所谓“出入于佛老”。王阳明早年就同道士有过接触。他十七岁在江西洪都（今南昌市），结婚那天，曾独自散步到城内的铁柱宫，听道士谈养生之术，直到第二天才回家。以后，他继续同道士、佛教僧侣来往，曾产生过遗世入山的念头。到失望于程朱理学，而自己哲学观点尚未系统形成的时候，他就曾把学术活动的兴趣，转向道教和佛学方面，企图从中寻求修身治国的道理。三十岁那年，王阳明游九华山，住在无相、化城诸寺，听道者蔡蓬头谈神仙的故事。隐居绍兴阳明洞的时候，曾按道家的方法修养。静坐久了，有时想远离人世。但终因抛不开封建伦理纲常，挂念祖母和父亲，又从洞中跑了出来，并表示醒悟说：“此念生于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断灭种性矣。”（《年谱》）

从此以后，王阳明渐渐觉得佛道不对头。他养病在杭州时，常常来往于南屏、虎跑诸庙寺间，听说有禅僧坐关，三年不语不视。王阳明喝道：“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，终日眼睁睁看什么！”僧惊起，开视对话。王阳明问他家里情况，僧回答说：“有母在。”再问：“起念否？”僧答：“不能不起。”王阳明指点他爱亲本性的道理，僧涕泣感谢，第二天就走了。有一次，王阳明听到学生王嘉秀、萧惠好谈佛道，就说：“吾幼时求圣学不得，亦尝笃志二氏。其后居夷三载，始见圣人端绪，悔借用功二十年。二氏之学，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，故不易辨，惟笃志圣学者，始能究析其隐微，非测亿所及也。”（《年谱》）这就是王阳明

从信奉到离开佛道二氏的过程。

既然“支离决裂”的程朱理学，和超脱尘世的佛道之学，对于修身治国都无济于事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就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，即创立主观唯心主义“心学”的阶段。一五〇五年，王阳明三十四岁，在北京与主观唯心主义者陈献章的学生湛若水交上了朋友，共同倡导所谓“圣人之学”。第二年即被谪到贵州龙场，其后四年间，王阳明意志消沉，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。久而久之，胸中洒洒，思念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据说，一天夜里，王阳明大悟格物致知，寤寐中好象有人说话，不觉呼跃，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过去向事事物物求理是错了。他默记《五经》的内容，来论证他所悟的一切求诸于心的道理，据说没有不符合的。这就是他事后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所谓“龙场之大悟”。

一五〇九年，王阳明三十八岁，被聘为贵阳书院的主讲。他第一次提出了“知行合一”说，大谈知行是一个工夫，要求人们按照封建道德准则去修养，“反省求内”，“只信良知”，“只依良知行”。此后，他一再强调“只教学者存天理，去人欲，为省察克治实功”。说什么“学者欲为圣人，必须廓清心体，使纤翳不留，真心始见，方有操持涵养之地”。（《年谱》）

在贵阳讲学时，王阳明曾进行“朱陆同异之辨”。此后数年间，都继续谈论这个问题。王阳明认为，陆象山之学虽然粗一点，却继承了孔、孟的“道统”。并表示自己“欲冒天下之讥”，去推翻四百年来“是朱非陆”的定论。（见《年谱》）

王阳明五十岁时，在南昌开始揭示他“致良知”的学

说。他说自己从经过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，愈益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，出生死。一五二四年至一五二七年春，王阳明在浙江从事讲学活动，他在绍兴先辟稽山书院，后立阳明书院，并讲学于余姚龙泉山寺。当时学生来自四面八方，环坐听讲者，多至三百余人。他大谈“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事，心外无理”，万物同体，各求本性，致极良知，以止于至善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道德修养方法。

上述关于王阳明学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，只是大致的概括，在时间顺序上往往有所交叉，很难机械划分。要详细探讨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演变情况和实际内容，必须查阅王阳明的全部著作。这些著作由他的学生们汇编成《阳明全书》，共三十八卷。其中，《传习录》和《大学问》，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。《大学问》是王阳明向学生讲授《大学》时的记录，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纲要。《传习录》是王阳明言论的汇编，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。在《阳明全书》中，还有大量的奏疏、书信、杂著、诗赋等，对于研究王阳明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，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
## （二）王学产生的社会原因

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，他的哲学正式形成于正德、嘉靖年间。在这一时期，产生这种哲学思想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的。

自一四四九年（明英宗正统十四年）的“土木之变”以后，明代开国初期那种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，已成过去，原来潜伏着的各种社会矛盾，都逐一暴露出来。到了正德年

间，如王阳明所说，“今天下波颓风靡，为日已久，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！”（《答储柴墟》）这就是说，社会危机已深重到“病革临绝”的程度了。王阳明的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。当时的社会危机，既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激化的表现，又带有时代特点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：

第一，随着土地集中，剥削加重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。明初，由于元末农民战争中消灭了许多大地主，加之朱元璋采取了移民垦荒等发展生产的措施，土地问题较为缓和。但是，随着明王朝统治基础的稳定，土地兼并也就开始了。土地兼并的加剧，突出地表现在皇帝和宗室对土地的掠夺。一四二五年，明仁宗建立“皇庄”，后来“皇庄”逐渐扩大。明武宗即位第一个月就建立“皇庄”七处，并逐年增加到二百多处。到正德九年，仅畿内“皇庄”占地就达三万七千五百九十四顷四十六亩。“皇庄”之外，还有藩王、勋臣、外戚占有的庄田。明初，朱元璋曾赐各藩王庄田千顷，赐勋戚庄田多者百顷。随着藩王、勋戚的不断增多，赐田数量随之扩大。这些藩王、勋戚又通过向皇帝乞请和擅自强占民田等手段，不断扩大自己的庄田，有的扩大到原来土地的七、八倍，甚至有扩大到五十倍的。到嘉靖年间，这种庄田占地已达二十万顷，约占全国耕地的二十分之一。和明代的政治状况相关，宦官强占民田也成为一个问题。有的宦官甚至占地二万余顷，宦官的弟侄也往往“田连千顷”。在皇室和权贵的带动下，一般地主也竭力兼并土地。这样，大量土地被各类大地主兼并掉了。据统计，从明初洪武年间到王阳明青年时代的弘治年间，赋田的数字减少了四百二十七万顷，失额达到二分之一。《明史·食货志》

说：“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，天下额田，已减强半”。这些土地，“非拨给于王府，则欺隐于猾民”。这就是说，不是拨给贵族（王府），就是被豪强地主（猾民）霸占了去。

随着土地的兼并和高度集中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必然加重。一方面，国家日益繁重的租税，大量落在迅速减少的自耕农和中小地主身上。据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二载：仅正统元年成化二十三年这五十三年中，田赋银两就增加了四倍。另一方面，地主阶级的地租、高利贷、额外剥削，弄得农民“勤劳一年，依然冻馁”。这样，造成了大批农民破产流亡。在王阳明出生前三十多年的正统年间，流民已遍及全国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当时有的县农民逃亡的已达半数以上，有的县“千里一空，良民逃避，田地抛荒，租税无征”。这些逃亡的农民，“往往车载幼子，男女牵扶，警疾老羸采野菜、煮榆皮而食，百十为群，沿途住宿。”（均见《正统实录》）农民的大规模流亡，必然导致农民举行暴动和起义。从正统年间开始，农民起义就不绝于书。主要有：一四四四年，叶宗留领导的浙、闽边界农民、矿徒起义；一四四八年，邓茂七领导的福建农民起义；一四六四年，湖北荆襄地区爆发流民大起义；一五〇八年，王浩八等率众于江西万年县姚源洞起义。特别是一五一〇年，刘六、刘七在河北一带即京畿地区发动的农民大起义，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。义军所到之处，“乡民奉牛酒，甚者为效力”。（《明史·武宗纪》）起义军转战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西等八省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，曾给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，《明史》也承认说，“流寇蔓延，几危宗社”。



这种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，成为明代中叶地主阶级最为担心的问题。刘六、刘七起义之际，正是王阳明从贵州复出，到南京、北京当官的时候，对于这次起义的情形，他是应该清楚的。后来，他又两次去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。这些，对于他摒弃朱熹学说，创立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有着深刻影响。在王阳明看来，封建制度是天经地义、不能更改的。他在分析为什么农民起义此起彼伏、连绵不绝的原因时，归结为对农民的思想统治和封建道德教育太薄弱，以至“凶狠贪暴，利己侵人”。（《告谕各府父老子弟》）也就是他所说的：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，区区翦除鼠窃，何足为异，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，以收廓清平定之功，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。”（《与杨仕德薛尚谦》）因此，王阳明在扑灭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，进一步坚定了创立自己的学说的决心，把它作为“破心中贼”的理论基础。同时，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，还通过办“乡学”的方式，把“致良知”的说教加以实践。他要老百姓“心要平恕，毋怀险谲，事贵含忍，毋轻斗争”，企图造成“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从，长惠幼顺，勤俭以守家业，谦和以处乡里”（《告谕各府父老子弟》）那样一种封建统治者所理想的“王道乐土”。自然，这是一种注定要破产的幻想。

第二，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及其带来的矛盾。我国的封建专制主义，发展到明代时已经是登峰造极。明初，承元制设中书省。中书省总掌全国大政，丞相对政务有专决的权力，统率百官，只对皇帝负责。在军事上，设有京师大都督府，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。一三八〇年（洪武十三年），